

何其芳全集（7）

何其芳 编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书 名：何其芳全集（7）

作 者：何其芳

出版社：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

ISBN：7-202-02529-9 / I217.32

定 价：24.00

出版说明

何其芳先生是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十分著名的诗人、散文家、文学批评家和古典文学学者。他的诗和散文，几十年来始终受到人们尤其是青年朋友的喜爱，他在文学理论和古典文学研究方面，更具有相当高的造诣。我们河北人民出版社首次推出的八卷本《何其芳全集》，是对何其芳先生一生文学成就的全面总结，它将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研究，留下一份珍贵的资料。

《何其芳全集》收入何其芳自三十年代以来写作的诗歌、散文、小说、文艺论文、序跋以及翻译作品、书信、日记等，约二百七十万字，是一部尽可能完备的何其芳著作总集。

《何其芳全集》以作者生前亲自编订出版的十四部著作作为主体，并收入作者夫人牟决鸣女士在作者逝世后编定的《何其芳诗稿》，和作者的友人著名诗人、翻译家卞之琳先生编选的《何其芳译诗稿》两部著作，同时，还汇集并编入迄今为止所搜集到的散见于各种报刊的创作、论文、序跋、书信和日记等文稿。

《何其芳全集》在编排上，遵循体裁和编年相结合的原则，按体

裁编年排序，二者兼顾，将全部作品汇成八卷。这为凸现作者的文学风格，更集中地研究作者的多项文学成就，提供了便利。

为了最大限度地保留文学发展史的真实面貌，为了保持何其芳著作的完整性，我社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将作者所能找到的作品全部尽收其中。由于历史的原因，作者的有些文章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今天我们出版它，并非表示我们赞同它的观点，我们的目的是努力存真求实，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研究特别是关于何其芳的研究提供完整真实的资料。所有编入全集的创作和论著，都未作删改；注释除加以说明者外，都为作者所注。

作为全集的编选者，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蓝棣之先生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从版本的选取、文章的增补和编排，都反复推敲，力臻完善。特别是，蓝棣之先生为全集撰写的长篇序言，剖析深刻，见解独到，求真务实，颇具学术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张炯先生于百忙中，抽出时间特为撰序，以表支持。全集出版过程中，还得到作者夫人牟决鸣女士的大力帮助，在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限于种种因素，全集在编辑和校勘等方面，粗疏错漏之处在所难免，希望得到广大读者和研究者的批评指正。

河北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八年十月。

序 一

张 炯

何其芳是我国二十世纪著名的诗人、散文家，也是著名的文学理论家、评论家和学者。他在新中国成立后，曾长期担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副所长、所长，为这个研究所的行政工作和学术建设付出了巨大的辛劳。他撰写的许多论文和著作，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拓展和深化古典文学研究、特别是《红楼梦》研究，在促进现代中国新诗发展和普及诗歌知识等许多方面，都作出杰出的贡献。晚年他还创作了不少旧体诗和《毛泽东之歌》这样激情洋溢的长诗，为他的诗人生涯注上了一个最后的句号。现在，河北人民出版社继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何其芳文集》之后，又出版了由蓝棣之同志主编的《何其芳全集》共八卷，这无疑是为我国文学界所做的一件大好事！承蒙编者和出版社要我为全集写篇序，我

感到既荣幸又义不容辞。

对于我，其芳同志既是老前辈，也是老领导。一九六一年我从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当时的所长正是其芳同志。文学研究所原设在北京大学，一九五六年才划归中国科学院。首任所长郑振铎先生因兼任国家文化部副部长和文物管理局局长，所以，文学研究所的常务工作一直由其芳同志主持。一九五八年郑先生因空难去世，其芳同志便继任文学研究所所长并兼《文学评论》双月刊主编。我到所工作后第一次谒见其芳同志还是为了我在《文学评论》上发表的一篇评论《甲午海战》兼论历史剧的文章。那原是我在《文学评论》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该刊编辑张晓翠同志要我整理成文发表。等到我看清样时，发现一些段落已被删去。我不同意删这么多。晓翠同志叫我去找其芳同志申诉意见，因这是其芳同志亲自删的。我当时有些惶恐，心想自己是刚来的大学毕业生，怎么敢去找所长、找一位权威学者申辩呢？晓翠同志见我犹豫，便鼓励我说：“没有关系，其芳同志很平易近人，你到他家去找他好了。”于是，当天下午我便到北京站附近的西裱褙胡同其芳同志的寓所去找他。没想到，他因染感冒，正发烧卧床休息。我更加惶恐，深感自己的唐突，本想立即退出，不料其芳同志听说有人找，便立即披衣起床，招呼我进入他的卧室。

尽管他的大名久为我所敬仰，但见到他本人，这却是第一次。当时他不过四十多岁，中等身体，圆胖的脸膛戴副眼镜，讲一口带四川口音的普通话。他热情地招呼我坐下，并说：“晓翠来电话，说你对自己的文章被删掉些段落有意见。你可以说说看，我们来共同商量一下，

看看是不是删得太多了。”于是，他就把我的文章清样摊在桌上，让我坐在旁边，重新浏览这篇清样。他用又白又胖的滚圆的手指，指着一行行被删去的文字，征求我的意见，并说明他为什么觉得这段文字可删。最后，他为我恢复了一些段落，承认某段删了，上下文气就不接了。但坚持有些段落应该删，并说：“你把这个剧本与席勒的《阴谋与爱情》的某些方面相比是不恰当的。《阴谋与爱情》是世界文学名著，《甲午海战》虽然写得不错，毕竟还没有达到世界名著的水平。”他还说：“评论作品一定不要过于溢美，一定要有广泛的比较。比如看乒乓球比赛，你如果没有看过世界水平的比赛，你会觉得某某的球已打得很好了。但如果你看了世界冠军级的比赛，那你对其他球员的评价就有分寸得多了。写文学评论，道理也一样，一定要多读世界名著。”他的谆谆善诱的谈话，使我心悦诚服。看着他因发烧而透出红晕的面孔，我被他的真诚、热情和坦率所深深感动，而且深为他抱病起床为一个青年人的文稿居然谈了半个多小时，心中感到十分内咎和不安！

后来接触多了，才知道其芳同志的为人向来都这样真诚、热情和坦率，对扶植年青人尤不遗余力。文学研究所有许多年青人的文章在《文学评论》上发表，大多都经过他的认真修改的。即使召开全所大会，他对百多位工作人员讲话，也像跟朋友交心一样，娓娓道来，既真诚、热情，又十分得坦率。其芳同志是诗人，容易激动，有时讨论工作也常常因意见不同而争得面红耳赤。但争过后就平静下来，同志关系照常很好，不存芥蒂。

在我心目中，他是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忠诚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典范。他不仅平时工作勤恳，“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打倒，成为

“黑帮”，被罚去打扫厕所时，他每次总是把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非常认真。红卫兵斗争他，问他是不是“三反分子”？他总不承认自己是“三反分子”，只承认“有错误”。尽管因此他常常吃苦头。后来到“五七干校”，分配他去喂猪。我们干校在河南息县，那里的土地很怪，晴天硬如铁，下雨便成泥，又烂又滑。雨天总见他穿着塑料雨衣，套双长筒胶皮靴，挑担沉甸甸的猪食，在烂泥中淌水颤颤悠悠走去。其勤谨和认真决不亚于做学问。后来他甚至还编了一首《养猪经》，其中有云：“猪忧亦忧，猪喜亦喜。”他是把养猪看作当时党和人民交给他的工作任务来对待的。其真诚和笃实以至于此！

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同志主持国务院，指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恢复业务工作。其芳同志十分振奋，立即率领全所同志打扫卫生，搬运图书，并调集力量准备恢复《文学评论》双月刊，亲任刊物领导小组组长。粉碎“四人帮”后，他更是精神焕发。为了抢回十年动乱丧失的时间，他格外辛勤地工作。除了到所上班，还夜以继日地写作，包括创作了他最后的一首诗，也是他惟一的长篇抒情诗《毛泽东之歌》。一九七七年他终于不幸得癌症，胃出血，手术抢救不果，心肌衰竭而逝。

他实在不仅是优秀的共产党员，也是优秀的文学所所长。当时我曾写了篇缅怀他的文章，题为《斯人已逝，师范长存》，发表在《文艺理论与批评》双月刊上。其芳同志对文学研究所的贡献是后人难以忘却的。这个研究所能有现在的五十万册藏书，其中大部分就是他任所长期间派人从全国各地搜购收集来的，包括许多珍本、孤本和善本。文学研究所于六十年代编写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中

国现代文学史》和《文学概论》等重要学术著作，都是他亲自组织力量并参与讨论提纲，乃至审阅部分初稿的。为了培养年青的研究力量，他不但亲自为他们拟定必读世界名著三百余部，还坚持人员有进有出、升优汰劣的制度。

在具体从事科研工作方面，他更是勤谨、严肃、实事求是的楷模。他总是上午到研究所处理行政事务，召开必要的会议。当时他还是哲学社会科学部党委委员，兼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日间工作忙、会议多，他的科研工作基本都在晚间进行。夜晚他一直工作到下半夜三四时才就寝。他的《论红楼梦》、《论阿Q》、《不怕鬼的故事序》、《战斗的胜利的二十年》等重要著作，都是在日夜辛勤的劳作中完成的。繁忙的行政事务和学术研究占据了他的全部时间，这就是建国后他写诗很少的主要原因。他长久怀有要写一部像《战争与和平》那样的长篇小说的宏愿。大家知道，一九三八年他与沙汀同志一道到延安，曾担任过鲁迅艺术学院的文学系主任。抗战胜利后，他曾被派到重庆去从事文艺界的统战工作并兼任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长，写过许多评论。离开延安时，毛泽东同志曾找他谈话，勉励他“不但要有松树风格，经得起风雪雷霆的考验；还要有柳树风格，插到哪里哪里活，与当地群众打成一片”。一九四七年奉命撤回延安后，他又随军到达晋察冀前线，担任过朱总司令的秘书。所以，对于战争与和平，对于中国人民从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所经历的伟大历史曲折，他有丰富而深刻的体验。非常可惜，由于工作任务的繁忙，他终于没能够完成写作这部小说的宏愿。尽管如此，他的全集使读者仍不难窥见这位学者兼作家一生写作的巨大成绩。如果说，他的早期的诗作和《画梦录》那

样的散文在三十年代曾经吸引文坛的注目,他到延安后的《夜歌和白天的歌》则在全国抗日青年和向往革命的人们心中激起过强烈的共鸣,那么抗战胜利后,他到重庆工作期间所写的大量评论则奠定了他作为评论家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建国后,他的主要成绩表现在文艺理论和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他的《论 红楼梦》是当代中国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于研究古典文学的公认力作。他的《战斗的胜利的二十年》则是六十年代对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我国革命文艺实践所涉及的重大理论问题的一篇最全面最深刻的总结。至今读来,他的注意既反“左”又反右的态度,他对有关问题的精辟深致的论述,都仍然给人以十分有益的启示。

可惜天不假年,这位卓具才华的勤奋的作家和学者过早地逝世了。否则,他一定会为我国文坛写出更多更好的精神产品,会为我国文学的发展作出难以估量的贡献。对于他的创作和学术成就,蓝棣之同志已在他的长篇序言中作了详细的介绍和评价。我只想说明一点。其芳同志前期创作成就较高,后期则学术成就较高。这种现象主要是由于他的工作重点的转移所造成的。我不赞同那种所谓“思想进步,艺术退步”,说什么由于他参加革命而必然导致艺术水平下降的论断。这种论断过于简单,缺乏具体细致的分析,不仅不符合何其芳同志的实际情况,更没有普遍的意义。大家知道,二十世纪许多作家是在参加革命后继续写出优秀的作品,甚至攀登自己艺术创造的高峰,如夏衍、田汉、赵树理、艾青、光未然、柳青、周立波、刘白羽、魏巍、梁斌、杨沫、吴强、郭小川、贺敬之、闻捷……,人们可以举出一大串著名作家和诗人的例子来说明参加革

命与艺术退步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其实，其芳同志对自己早期的唯美主义诗歌并不满意。他曾说过，“抗战以前，我写我那些《云》的时候，我的见解是艺术什么也不为，只为了抒写自己，抒写自己的幻想、感觉、情感。后来由于现实的教训，我才知道人不应该也不可能那样盲目地、自私地活着，我就否定了那种为个人而艺术的错误见解。”（《夜歌和白天的歌 初版后记》）我深信其芳同志这些话是十分真诚的。像他那样禀性真诚的人，连“文化大革命”中还坚持实事求是，不愿作违心之论的人，在艺术见解方面更无须去作什么违心之论。事实上他后来对于诗美的许多看法和见解是更成熟也更全面了。他晚年所写的一些旧体诗不仅思想老到，艺术也十分精致。建国后他所以写诗少、乃至长期不再写诗，如他自己曾表白过的，主要是因为工作岗位变换的缘故。他的《毛泽东之歌》写得过于匆促，有些清样还是在病榻上校阅的，病疾已经使他没有时间从容修改和加工了。这自然是令读者引以为憾的。

其芳同志的一生是无愧于他的时代和人民的。他的生命业已焕发出巨大的精神光华，留给了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留给了子孙后代。这八卷全集就是最好的证明。我希望广大读者珍视这位著名诗人、散文家、理论家和学者的精神遗产，并继续加以发扬光大。当然，像一切卓越的人物一样，他也难免有着自己时代的认识的历史局限，从中，人们也不难吸取一定的有益经验和教训。

一九九八年七月四日于北京望京新城。

序 二

——略论何其芳的文学与理论遗产

蓝棣之

在二十世纪的文坛和学术界，何其芳是一位重要的很有影响的人物。三十年代何其芳是崛起于当代的现代诗人和抒情散文作家，有诗集《预言》、散文集《画梦录》等传世；四十年代是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和活动家，有论文集《关于现实主义》等传世；五六十年代是权威的文学批评家，举足轻重的文艺活动家，富于创见的古典文学学者，还有他那些在青年中产生很大影响的诗歌创作论与鉴赏论，有《论红楼梦》、《文学艺术的春天》、《关于写诗和读诗》等传世。作为一个作家，一个学者，一个理论家和活动家，其活动跨越了五个十年，留下了真实而重要的记录，我们不可以置之不顾。同

时也要说明，这部八卷本的《何其芳全集》是一份历史的记录。中国的文艺思想、文艺观念和文艺政策，在经历了八十年代的文学新时期和九十年代的后新时期之后，大大变化了，何其芳的很多论点自然都不一定合时宜，或并不一定都正确；我所要在这篇序言里为读者提供的，是他所由走过来的学术道路，其思想脉络和时代原因，从而为二十世纪的文学及其理论的历史发展，它与政治的关系，提供证词。

何其芳创作与论著的价值和重要性，它的魅力，包括它的缺点与局限，迄今并未得到全面的论述。由于在编选这部全集期间对于何其芳作品和论著的思索，我逐渐地形成一些看法，现在整理出来，提供给关注二十世纪文学及其理论发展的读者参考。

一、诗创作：从唯美主义到现实主义

何其芳的文学活动是从写诗开始的，他有很高的写诗才华，写得不算少，中年以后还一直保持着写诗的激情，然而作为成果，主要是正式出版了三本诗集：《预言》、《夜歌》和《何其芳诗稿》等。

《预言》是早期创作的诗集，创作时间为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七年。在他开始写诗的时候，诗坛上正吹起一股象征主义诗风，他对此多有感染，从诗的情调、意境和句式来看，他最初很受了一些当时诗坛上象征主义诗风的代表诗人戴望舒的影响，更早一些时候，他则受过浪漫主义诗人徐志摩的影响。用何其芳自己的话来说，他是被蛊惑于晚唐五代诗词的精致冶艳，和那种憔悴的红颜上的妩媚，

后来又有对几位巴那斯以后的法兰西诗人如瓦雷里等的迷醉。何其芳这些话是就新诗当时和前此所接受的西方象征主义和巴那斯主义文艺思潮而说的，晚唐五代也曾出现一股可以叫做象征主义的诗风。这些也都是那个时代的先锋文学。《预言》里最富于体验、最有特色的，也最下功夫雕琢的，还是写于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三年的那些关于爱情与青春的诗歌，其中好些诗都表现出诗人从体验里创作的创造性才能。例如他这样对比地来写南方北方的爱情：“南方的爱情是沉沉地睡着的，/ 它醒来的扑翅声也催人入睡。”“北方的爱情是警醒着的，/ 而且有轻 的残忍的脚步。”（《爱情》）再例如他用“繁实的葡萄藤”来比喻围上脖颈的来自情人的“柔柔的手臂”，又用“树根在热的夏夜里震动泥土”来自喻与情人拥抱时胸间的颤跳（《夏夜》），都很新颖。还有，在《赠人》与《再赠》里，不写一句通常的情话，却写诗人的忌妒：“你青春的声音使我悲哀。/ 我忌妒它如流水声睡在绿草里，/ 如群星坠落到秋天的湖滨，/ 更忌妒它产生从你圆滑的嘴唇。”通常所谓写诗者的才华一大半可谓是比喻的才华，这里我们又领略了何其芳的比喻的不同寻常，回味无穷。再有，他不写一句通常的情话，却写一种特别的“忧愁”：“你如花一样无顾忌地开着，/ 南方的少女，我替你忧愁。/ 忧愁着你的骄矜，你的青春/ 且替你度着迁谪的岁月。”这几句诗，写尽了唯美主义者对于人生的忧伤。

《预言》一首是诗集《预言》里第一首诗，写于一九三一年秋天，其中一再提到的“年轻的神”，典故来自法国后期象征主义大师瓦雷里的长诗《年轻的命运女神》。瓦雷里这首晦涩难解的长诗，按

照当时著名诗人与翻译家梁宗岱的解释，是写一位年轻的命运女神，或者不如说，一个韶华的少妇，在深沉幽邃的星空下，柔波如烟的海滨，梦中给一条蛇咬伤了，她回首往日的贞洁，想与肉的诱惑试作最后的抗拒，可是终于被荡人的春气所陶醉，在晨曦中礼拜光明与生命。何其芳写《预言》这首诗，是勉励自己成为预言里无语而来，不被歌声留下的“年轻的神”，是说他要“与肉的诱惑试作最后的抗拒”。事后二年，何其芳专门写了一篇名叫《夏夜》的剧本，来解释“预言”这个他生命里的“母题”。在这里，故事更复杂了，诗意被展开了，思想更深了。剧本里说：为甚么要让那“年轻的神”无语走过，不被歌声留下呢？为的是想使他成为一个“年轻的神”，尽管可能失悔，但比较起被留下来，失悔更美丽、更温柔。他说他曾经在初恋里“装扮”过一个“年轻的神”，但完全失败。当初的恋人虽然分手了，而且留下来的都是不好的记忆，但“那记忆一直缠着我”。而今的诗人仍然坚持要再试试他这种对于肉的诱惑所作的抗拒。他说爱情使他更了解爱情，更会献身爱情。他的爱情观是：“爱情是要用痛苦来培养，而且是用痛苦来衡量的。”所以在剧本的故事里，男主角说：“我还是渐渐地爱上你了，我渐渐地需要你底爱了，所以我明晚要走了。”这里的原因还是因为“我是不快乐的，我是有病的”，“我已没有了青春的心，我已没有了健康的爱，我是有毒的，所以我要把自己关起来”，“很久以来，我活了一年就如活了十年似地。我活得太多了，我知道得太久了，所以我不能爱一个人了”。假如我们问：“年轻的神”这种对于爱情的哲学态度是在逃避爱情吗？真是病态的吗？回答是：不是简单的逃避，也不是单纯的病态。何

其芳后来在一九六四年评论电影故事片《早春二月》时，对于故事的主角萧涧秋“为什么最后要逃走呢？”这个问题说过一些话。作者认为萧涧秋在一封信里所陈述的理由，“完全是一些梦呓似的话”，然后，他分析说：“总之，只能说这是表现了旧社会的某一种知识分子的可耻的脆弱：既怕议论，又怕变故，还有喜欢猎取异性的感情而又怕这种感情。”何其芳这些话讲得这样深，虽然不一定符合萧涧秋的情况，但却可以认为包含着何其芳本人早年的一些体验，因而可以看成是对于《预言》和剧本《夏夜》的一种评论。就何其芳的情况说，他的脆弱和对于爱情的逃避，还是因为他童年的遭际。因为在乱离中，他缺少关注，缺少爱抚，“十一二岁，我就与旧小说作了密切的伴侣，日子都在那里面过去了”。这种经历，培养了他对于想象世界的眷恋和对于现实世界的逃避。此乃何其芳早期创作生涯中的唯美主义：艺术高于人生，想象高于现实。然而，也正是这样一些复杂而又深入的体验与思考，使何其芳看到了爱情与痛苦的内在联系：爱情是要用痛苦来培养，而且是用痛苦来衡量的。也许这是爱情的最高训条！

《夜歌》是何其芳在当时的抗日革命根据地延安创作的诗歌，其基本构成是一九四一年从春到冬写成的抒情组诗《夜歌》（1—7）。“夜歌”的取名是因为它们大都在繁忙工作之后的夜晚或凌晨写就，然而，在政治意识形态色彩很浓的时代，“夜歌”这名称有可能会被误解，因此在再版时改名为“夜歌和白天的歌”。《夜歌》是对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一个以拯救民族的存亡为己任的以农民为主体的武装集团里所面临的思想感情问题的诗性回答：一方面是为教育

别人，一方面也是为了要求自己。这些诗篇写得真诚，亲切，富于哲理性。一九四〇年和一九四一年是何其芳写诗的第二次高潮，并一直延续到一九四二年春天。几年来他在广阔的背景上驰骋自己的诗思：延安的生活，北中国的抗日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他个人的过去和他的故乡的过去，古今中外的文学和哲学，等等。最终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句：“生命并不虚伪，/ 我们承认自然的限制。/ 在限制里最高地完成了自己，/ 人就证明了他的价值和智慧。”或许可以说，何其芳的《夜歌》是毛泽东主席一九四二年五月历史性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一个预兆，人们可以从这里看到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内心深处，在世界观和感情上所发生的真实变化。“夜歌”时代的何其芳已经从唯美主义的象牙之塔走出来，试图在工人农民中间生根开花。他的艺术眼光已经从象征主义诗风转向惠特曼和马雅可夫斯基。《夜歌》中的很多诗篇在发表前都在当时何其芳任教的鲁艺文艺晚会上朗诵过。这就是说，《夜歌》是为这些献身于民族解放事业的年轻的工农知识分子而写的，这给这些诗带来了广泛的群众性，昔日的朦胧难解不见了。也正是在这里，何其芳重新发现了自己，也重新发现了生活。《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是对于自己诗作特征的新发现，诗人的声音从昔日的未老先衰而变得年轻了；《生活是多么广阔》告诉我们，快乐与生活连在一起，一切未知的东西——意义、价值、希望等等，都要求我们如发掘宝藏那样去发掘，而快乐产生于发掘之中。

《何其芳诗稿》是何其芳五十年代以来诗作的结集，事实上它是作者病逝后，由他夫人编辑的遗作。解放后由于工作的需要，何其